

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



主编 倪蕊琴 副主编 陈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0462380

论中苏文学 发展进程 (1917——1986)

主编 倪蕊琴 副主编 陈建华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022165

书号 I06

N67

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

倪蕊琴 主编

陈建华 副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4 字数:295千字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本

ISBN7—5617—0790—8/I·063 定价: 平 6.60 元
精 8.60

绪 论

中苏文学发展进程比较 (1917—1986)

社会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中苏文学各自发展的规律性有利于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和把握。中苏两国有着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苏文学的交流源远流长。同时,中苏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传统。因此,中苏社会主义文学既有历史类型学的类似,又有各自的民族特点。比较研究中苏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进程,分析我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交往中的积极、消极因素,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将有利于展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前景。

中苏文学的广泛交往始于“五四”时期。当时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与剥削的中国人民及其先进知识分子,为探求救国真理,自然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产生极大兴趣,把译介俄苏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如“五四”后八年间,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的占65部,超过三分之一(还不算散见

报刊的大量译作)。^①因为“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启蒙与救亡密不可分,“文学革命”很快变成“革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汇入了以苏俄为主体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经过“左联”时期和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并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以理论概括,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以“为工农兵服务”为方向,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为标准,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文艺思想体系。

新中国诞生后,中苏文学的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40年来,苏联文学依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源而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纵观中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颇具戏剧性的文学关系,我们大致可以描划出这样的基本轨迹:接受时期(50年代)→排斥时期(60—70年代)→选择时期(80年代)。而中国的第一、第三、第四次文代会又分别成了这三个时期开始的里程碑式的标志。其中50年代中苏文学主要表现为同期对应关系,60—70年代大体是逆向对应关系,80年代则基本上是错位对应关系。

建国之初,新中国文学界以极大热情全面介绍苏联文学。短短几年中就有上千种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一批以新时代新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作品以几十万、上百万册的印数广为流传。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费定的《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等等。像以往一样,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仍然是踏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直接影响着建国初期的中国文学的基调和底色。但这时期的译介工作存在着盲目照搬,缺乏选择的倾向。不仅译介过来的作品中有不少平庸之作,而且译者往往把一些按照“无冲突论”模式写就的作品(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等)也当作艺术佳作推荐给了中国读者。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翻译总目》。

相对于译介而言,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 50 年代文学的影响就显得较为复杂了。在整个 50 年代中,这种影响既表现为大体的同期对应关系,也呈现出阶段性相异的色彩。

第一阶段为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1949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第一次文代会是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特别是左联时期的文学运动和解放区文学运动)的一次总结。它肯定了《讲话》的方向,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周恩来同志在长篇报告中涉及的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的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领导问题等,正确而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这次会议上较多的强调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经验,而对新时代如何调整某些政策和做法则研究不够,特别是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仍存在不少片面认识,这就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而这一隐患又与同一时期的苏联文学思潮合拍,于是它的危害性立刻就显示了出来。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日丹诺夫式的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决文学问题,用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口号鼓起“无冲突论”风帆的时刻。在 1946 年至 1949 年这几年里,联共(布)中央对一系列具体的文艺问题发出了近 10 个决议。这些决议对某些作家及其作品作了无端的指责和粗暴的干涉。当时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称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等作家为反动的“市侩”、“荡妇”,将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划入“反动的文学派别”。50 年代初,这种情况仍无改变。如 1951 年《真理报》接二连三发表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批判乌克兰诗人普罗柯菲耶夫,乌克兰党中央也为此作出专门的决议。日丹诺夫等人明确表示,文学家应“以政策为指针”,^①苏联文学就是在“反对一切敌视苏联人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成长和

①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

巩固起来的。”这些决议、报告和文章当时都被一一翻译过来，刊载在中国的许多重要报刊上，直接影响着以仿效苏联文学动向为时尚（当时《学习苏联文学的先进经验》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的中国文坛。50年代初，中国文坛对《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就有着这种影响的明显迹象。如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批评诗人别德内依的一封信，信中指责诗人把“对苏联生活缺点的批评”“变为对苏联的诽谤”。《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认为这封信的精神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思想原则是相通的。又如1951年6月《文艺报》发表批判肖也牧创作的文章，认为作者的“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罢？”当时，不仅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把日丹诺夫式的政治干预看作是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必要手段，而且许多作家也真诚地或诚惶诚恐地校准自己的方向。在这样的气候下，文学创作当然只剩了一片光明的底色。此外，日丹诺夫的文学家应“以政策为指针”的理论也左右了5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有的同志在一次文代会上就反复强调了文艺工作者为党的政策服务的重要性。后来有的同志继续作了发挥，认为：文艺必须服从政治，而“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政策”，只有以政策为“指针”，才能增强作品的“政治力量与艺术力量”。^①至于当时以配合政策宣传的“赶任务”为荣，就是这种理论的直接产物。从文艺为政治服务到文艺为政策服务直至文艺就是“写政策”“赶任务”，这种观念虽然也有人抵制，但仍一再顽强地冒头，它对中国文学产生的消极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二阶段为50年代中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文学进入了当代时期，对整个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解冻文学”思潮也由此萌发。奥维奇金的小说《区里的

① 《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

日常生活》作为“苏联当代文学的第一只春燕”在苏联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一动向立即为中国文坛注意。不仅奥维奇金等作家的“解冻文学”作品被及时译成中文,而且某些访苏作家还与他们作了深入的交谈。1953年前后,苏联文坛批判“无冲突论”的文章被不断介绍到中国。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传出的新的气息,也为中国文坛,特别是一些敏锐的作家感受到了,文学界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周扬还率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1956年苏共中央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苏联的“解冻文学”出现高潮,并迅速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强有力的影响。5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面对的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国际文化背景。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除了继续强调文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外,有两个方面令人注目。一是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的报告对这一点作了较充分的阐述。这是继1933年周扬首次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来,中国文坛对这一概念的最深入的一次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着重反对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绝对的和唯一的模式来规范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做法。二是批评了建国初期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会上,茅盾指出: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出现,是因为有些作家“常常是在生活矛盾和冲突前面轻易地避开了。”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在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有的与会者还指出,文学批评中的教条主义习气和行政领导的不恰当的干预,也“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上述两个方面既标志着中国文艺工作者理论水准的提高,但也不难看出苏联同时期文学思潮影响的痕迹。尽管以后的几年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反复(特别是在批判胡适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时),但是深入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趋向已不可遏制。在此后几年里文学创作获得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丰收,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曹禺的《明朗的天》、夏衍的《考验》、赵树理的《三里湾》、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风云初记》、刘知侠的《铁道游击

队》、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吐鲁番的情歌》等。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问世，为5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于是，中国作家也象同期的苏联作家一样，喊出了文学要“干预生活”，“积极参与生活”的口号；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也接连讨论起“写真实”、“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一批切中时弊的有创见的理论文章相继发表；王蒙等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批鞭挞官僚主义习气，真实地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作品；更多的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广阔的生活领域和揭示丰富的情感世界。这股浪潮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它所提出的一些口号，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与当时的苏联文艺界如出一辙。它所要否定的一些东西也是如此，这些东西本来有不少就是舶来品，如“拉普”思潮和日丹诺夫主义的余毒。遗憾的是，中国的这股浪潮如昙花一现，在57年夏的反右风暴中被骤然截断了。

第三阶段为50年代后期。苏共20大后，中苏关系出现某些裂痕，尽管中国文学界仍在热心地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中国作家仍在发表《苏联作家的道路是我们的榜样》这一类的文章，但是两国文学界已出现若即若离的现象。当时，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曾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这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加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中国在1957年至1958年对文艺领域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批判，苏联同期开展的“反修斗争”以及对所谓“一株毒草”《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都与此有关。反击国际反动派的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时中苏的主要领导人都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并且习惯地拿起政治宣判的武器来解决文艺领域的问题，以至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反右斗争以后，中国文艺界理论与创作活跃的局面不复存在，一批优秀作家中断了创作，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大为削弱，粉饰现实之作沉滓泛起。苏联的批判运动也使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从此沉默，

一批艺术佳作被禁止出版，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一度受阻。当然，苏联的情况相对好一些，此后不久“解冻文学”思潮又重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紧接着反右斗争，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文艺界也纷纷制定了所谓“创作大跃进计划”，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反右和大跃进使中国文坛上早已存在的极“左”倾向被强化了。与此同时，“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被正式提了出来。从理论界对这一口号的解释看，它的内涵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无相异之处。现在看来，用这一新口号来取代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是中苏文学关系开始冷却的一个征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口号的提出又与国内的大跃进的形势有关。有的理论家在阐释“两结合”时有意突出浪漫主义，或者准确地说，是用虚假的“浪漫主义”来压抵正视生活的现实主义，从而客观上助长了创作中的浮夸风气。50年代后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好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文学创作再次跌入低谷。

60—70年代，中苏文学关系进入全面冷却时期。在近20年的时间里，正式译或中文发表的苏联文学作品仅百余种，且大多是在1960年至1962年间问世的。这时期介绍苏联文学已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1961年译成中文的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因其所谓的“揭露了苏共20大后修正主义思潮在苏联泛滥的现实”而在中国受到格外推崇。“文革”期间，苏联文学终于成了禁区。肖洛霍夫成了“苏修文艺”的总头目，批判“苏修文艺”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一大任务。“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作为内部批判材料，还有一批苏联文学被译成中文。

这时期中苏文学发展的进程也不再具有同期对应关系。1959年5月召开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宣告从1957年开始的文艺界“反修斗争”结束。6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的热潮。1962年苏联作协与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人道主义问题与现代文学”的大规模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许多

批评家强调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成为苏联文学的灵魂，有人认为：“人的个人的本身价值和重要性问题，今天被提到了首位，这是很自然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假人道主义概念之间的最深刻的分界线之一——就是明确倾向于艺术上再现个人的重要意义。”^①有的批评家还指出：“人的完整性乃是组成真正人道主义观念的基础。这意味着，英雄气概、勇敢坚强、坚定不移，无畏精神，同爱、正直、义务、信任是同等重要的。”^②这次讨论会影响深远，极大地推动了60—70年代苏联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苏联文艺界也开始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世界各国的优秀的和有影响的文学，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苏联作家和读者逐渐熟悉了过去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糟粕”的外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60年代初，苏联文坛出现的题材内容五光十色，体裁样式别致新颖的“新小说浪潮”无疑与外来思潮的影响有关。苏联理论界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概念。尽管对这一提法有争议，但是它客观上推动了苏联文学在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以更开放的格局，汇流世界各国的文学经验和成果，使文学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此外，这时期苏共的文艺政策比较稳定，文艺思潮也逐步趋向平稳。如批评家库兹涅佐夫在70年代末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时所说的那样：“文学上的慷慨陈词和争论，思想上的不平静状态和苦楚已远远成为过去，”“极端现象消失了，文学生活中较为求实和建设性的气氛形成了，时代已变得不那么喧哗和那么紧张，”“文学的进程变得丰富多彩和复杂多样了。”^③因此，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把60—70年代称为苏联文学的一个丰收时期是恰如其分的。当然，这时期也有过两大文学刊物间的“歌德”与

① 谢尔宾纳：《现代文学中关于人的观点》

② 阿尼西莫夫《人道主义与行动》。

③ 《时代的人道主义本质》。

“缺德”之争，也有过引起轩然大波的“索尔仁尼琴事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停滞现象也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

5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的极“左”倾向严重地损害了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这使一些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同志深感不安。1959年中期至1962年中期，周恩来等同志做了大量的纠偏工作。在当时文艺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同志一再强调要提倡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反对对作家抓辫子、打棍子；反对片面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主张给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创作艺术风格的自由和探讨艺术问题的自由等等。在这期间，文艺理论界再次活跃起来，后来被“四人帮”诬蔑为“黑八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理论主张大多也是在这时提出来的。重新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即使这种形势在1962年中途逆转，其潜在的力量仍对6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创作产生着积极影响。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冰心、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邓拓、廖沫沙的散文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成就。

然而，60—7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标志着这一时期开端的中国第三次文代会（1960年7月）就是在倡导“持续跃进”和加强“反修斗争”的背景下召开的。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即使在大会的主要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也反映了出来。报告既肯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强调“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当前文艺界的重要任务；既肯定革命现实主义，又强调革命理想主义最适合于中国的实际。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指导思想急剧“左”倾，林彪、江青、康生勾结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文艺界掀起了一股股浊浪。从诬谄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始，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被打成了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大批杰出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文艺界领导人受到了批判。尽管其间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仍很激烈，但终因“四人帮”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大施淫威，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倍受伤害，直至在“文革”中遭到了几近毁灭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尽管中苏文学关系全面中断，但是由于处处以苏联文学为反面教材，结果竟形成了某种逆向对应的关系。例如当苏联文坛以开放的格局对待文学遗产和外国当代的文学成就时，中国文坛立即大批“厚古薄今”和“崇洋媚外”，并认为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尖锐分歧的问题”；当苏联文坛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肯定“个人是有自身价值”时，中国文坛则大批“人性论”和“人情论”；当苏联文坛大力塑造具有丰厚的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时，中国文坛却大反“中间人物论”，并以“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取而代之；当苏联文坛号召描写“科技革命时代的当代英雄”——企业家形象时，中国文坛则在“帮派文艺”中大批“走资派”，认为苏联的“当代英雄”与中国的“走资派”一样，都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当苏联文坛对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弊端和道德危机作出深刻的哲理反思时，中国文坛却在为“文革”大唱赞歌……这种大体的逆向对应的关系不能反映苏联当代文学的全貌，但却能清晰地看出“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以及极“左”思潮的长期侵蚀给中国文坛带来的严重危害和惨痛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召开的中国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的《祝词》为中国文学在历史新时期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奠定了基石。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苏文学关系开始恢复。1980年北京相继出现了专门介绍苏联文学的大型期刊《苏联文学》、《苏联文艺》（后改名为《当代苏联文学》）。随即，80年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译介苏联文学的高潮。十年来，译介成中文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是60—80年代的作品）已达五千余种。苏

联当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京、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叶夫图申科、万比洛夫等,为许多中国作家所熟知,他们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尽管80年代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是多元的,特别是1985年以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坛冲击甚大,但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在倏忽上下的文学热潮中,苏联文学在中国“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其中包括某些作家群)。一部分思考型的读者始终没有从当代苏联文学移开过视线。”这时期,中国文坛对苏联文学译介不仅具有及时准确的特点,而且更具有选择的目光,注意对苏联50年代以来的文学,尤其是近年来的文学作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鉴别。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其气势、力度和持续的时间都足以与50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相媲美。这两次为世人瞩目的波澜壮阔的文学思潮在其具体的形成原因、发展阶段、内在构成等方面自然有着许多的差异,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两股思潮在基本特征上存在着的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1.人道主义在文学中勃兴;2.“写真实”成为基本的创作原则;3.贯串始终的深刻的反思精神;4.对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再认识;5.思潮的波动与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中苏文学思潮的这种错位对应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汇流”现象(这里借用了俄国比较文学家维谢洛夫斯基的术语。“汇流”的基本含义是:“文学的影响和不依赖文学联系及其相互影响而相似的现象”)。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拓和形式探索等方面均受到50—8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的揭示,以及对当代“人的命运”的多侧面的描摹等等,几乎都可以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找到极为相似的对应面。当代苏联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深厚的

人道主义精神、道德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全球意识,引起了相当多的中国作家思想上的共鸣。例如,中国作家朱春雨的长篇小说《橄榄》显然受到80年代苏联文学中出现的“全球性思维”的影响。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贝科夫的《索特尼科夫》、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等新意迭出的军事文学作品在中国的遭遇,可以说是除了它们本国以外所获得的最热烈的关注和欢迎。朱向前等一些军队作家明确表示,新时期军事文学主要是受了苏联当代军事文学的影响。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大量触及的人生价值、历史报应、善恶、自审、代沟等主题,以及塑造的当代改革者(或称“实干家”)、当代“多余人”、当代知识女性等形象,也是60—80年代苏联文学所反复表现的。有人甚至认为,1985年以后出现的“新潮文学”也不例外,“莫言的‘马尔克斯的文体后却跳动着拉斯普京式的对故乡山水的眷恋,至于马原、刘索拉等现代意识较浓的先锋派文学,在骨子里则时常流露出东方青年试图摆脱传统而崇尚个性的苏联‘第四代’作家的精神伤痕。”^①这一说法虽然不无可挑剔之处,但是80年代中国文学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与苏联当代文学“汇流”,而与欧美文化大相径庭的格局,也是一目了然的。

与50年代相比,80年代的中国作家似乎更注意从苏联当代文学中择取有益的艺术经验,并加以积极的消化吸收。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都明确表示过对苏联当代文学艺术的钟爱之情。有的作家还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这种文学影响。如张承志曾一再表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对他的创作发生了“关键的影响和启示”;朱春雨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时也指出,他有意地研究了艾特玛托夫小说的艺术经验,并“有意把多层次的结构方式同我们的民族传统的美学观结合起来,引出了结构的衬比美含义。”从许多具体作品的比较中,如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和艾特玛托夫的《我

① 《在“欧美文学热”的背后》

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雅》，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利帕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德沃列茨基的《外来人》，赵梓雄的《未来在召唤》和赫拉勃罗维茨基的《驯火记》；乔良《远天的风》和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或在主人公生活轨迹的描写，或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或在揭示主题的视角，或在艺术表现的手法等方面的接近和有选择的借鉴。

当然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界在接受苏联文学时已比前两个阶段成熟，更多地采用了选择的目光。八十年代苏联文学引人注目的主潮是历史反思主题，其中不乏对历史进程的深层思考和哲理色彩。但有些作品在揭示极左路线和时代悲剧时，往往把读者引向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道路——从十月革命到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怀疑和否定。而对过去年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从平反、恢复名誉逐步升级，以至出现“索尔仁尼琴年”这样的现象。对于这类文学现象我国文学界已经能够较冷静、客观地分析，科学地予以评价。

同时还应该指出，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文学界也加强了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更是大量译介中国新时期文学。许多苏联学者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丰富的时期之一，无论从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上都有许多新的发掘和提高。中国当代作家王蒙、古华、张洁、冯骥才、谌容、蒋子龙、白桦等的主要作品都有译本，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当代中国小说选、诗歌选和戏剧选。其中不少作品（如《沉重的翅膀》、《芙蓉镇》等）印数都在5万—10万册。^① 苏联一些汉学家的研究重点也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向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这一切都说明当前中苏文学的

^① 这些材料根据首届“中苏文学关系国际研讨会”（1990年7月1日—5日在北京召开）上苏联学者提交的论文，会议论文集由北大汇编。

交往已从单向研究、单向接受进入在不同参照系的对比中进行两国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新阶段。

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内在结构方面的相似，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方面的迭合，在某些审美方式和审美标准方面的默契，才使中国新时期文学与苏联当代文学产生这种错位对应的“汇流”现象。当然，中苏两国在文化渊源、历史传统、民族精神等许多方面有着深刻差异，也正因为这样，两国文学才呈现出各自的风采。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扎根于丰厚的生活土壤，并在博大的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融入包括苏联文学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有益养料，才可能有光辉的未来。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対新中国诞生以前中苏文学交往的历史回顾。第二部分我们尝试从不同角度（或者分别考察、或者比较思考）梳理出一条中苏文学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第三部分我们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政策两方面进行了对比思考和阐述。第四部分内容比较广泛。我们集中剖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源地苏联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主题和体裁类型、艺术表现，探讨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的关系，这种具体分析更加深了我们对文学整体发展的认识。在最后一部分中，我们选编了60—80年代苏联的文艺政策，翻译了原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伊·米·格隆斯基回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产生过程的几封信件及其它资料。

本书是承担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中苏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进程比较》的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深感这一选题的难度，但是基于对其意义的坚定认识，加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坚持完成了这部论文集。当然，就这一研究课题本身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探索性的开端，要达到全面的和科学的结论，尚需作更大的努力。希望本书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得到专家的指正。

倪蕊琴 陈建华

1990年11月于华东师大